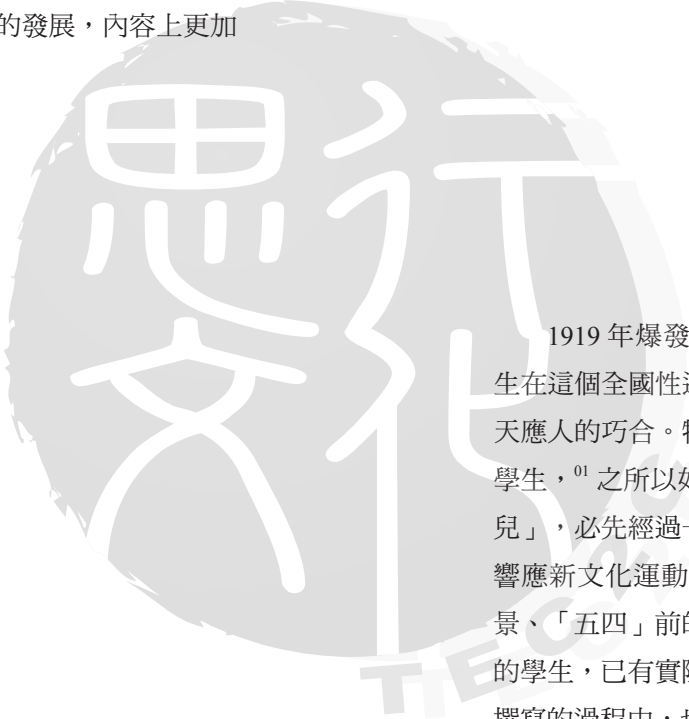


綜合以上的分析，我們可以知道「五四」以前，新潮社在學術討論或文學革命上的見解，本質都帶有所謂的科學精神。而在這種探究科學精神的過程上，也漸發展出一套與《新青年》不同的見解，而這也使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，內容上更加多元。

## 第六章

# 結 論



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，學生在當中扮演著主角。然學生在這個全國性運動中的核心地位，筆者認為，絕非是一種順天應人的巧合。特別是在五四事件中參與人數最多的北京大學學生，<sup>01</sup>之所以如此投入這場運動且可成為同時代中的「弄潮兒」，必先經過一種覺醒的階段。筆者從本文中，透過一個為響應新文化運動而成立的學生社團新潮社，其社團的成立背景、「五四」前的活動、及社團的主張，試圖證明「五四」前的學生，已有實際作為來累積其社會地位和影響力。而筆者在撰寫的過程中，也的確有了一些收穫。

01 這裡參考了周策縱的研究成果。周策縱曾做過一份統計，說五四事件有10所大學的學生參加，大學生在這場運動中的總人數共6111人，而其中北京大學的參與人數就高達2411人。周策縱，《五四運動：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526-527。

首先，在新潮社的成立背景上，蔡元培成為北大校長後所作的改革，是學生開始對新思潮產生興趣的關鍵。他用強制與誘導的雙重方式，來逐步落實北大體質的改變。而因蔡的改革，加上 1917 到 1918 年校內外氛圍的變化，讓新潮社得以在 1918 年底成立。

其次，新潮社的成員結構，是一種趨近於精英的小團體。不論是社員在地域、求學歷程等有關的人際網絡背景上，彼此間幾乎都有關聯。或是入社的學生社員，幾乎在加入新潮社前都已在北大校園內都有一定的知名度。透過這種篩選，讓這個看似人數不多的新潮社，得以有高知名度與較大的影響力。

而從「五四」前新潮社的活動內容來看，更可知該社的精英化成員結構，促成了他們在校內外的積極作為。這期間他們除致力辦《新潮》雜誌外，社員也藉參與校內聯合性質活動、以個人名義在其他刊物投稿等方式，宣揚新潮社的理念。又因新潮社每個社員都頗有主見，所以他們在宣揚某些集體意識的概念時，會因每個人的觀點加以修飾，讓此時關於新思潮的內容更為多元。

至於「五四」以前，新潮社的核心關懷，是提倡民主和科學精神。雖循著《新青年》編輯群的理念，然而他們關懷的層面卻有和《新青年》大異其趣。例如他們想表達的民主訴求，主要落實於對政治、社會、和文學革命三個議題的討論。而他

們對這些議題的探討，都在強調一種多元易一元的內涵。而此種內涵，實是他們所認定的民主價值。

而新潮社對於科學精神的認知，則是取決於有系統、符合常理、且是內容新穎的、進步的事物。所以，在這種標準下，他們談論的理念，就多帶有推廣這種精神的意味。而在這種探究科學精神的過程上，他們也出現了《新青年》編輯群不同的看法，也使得新文化運動的內容更加多元。

總之，藉由本文的探討，筆者試圖證明新潮社成立雖距「五四」爆發時間點很近，然他們的作為，絕對不是只有亦步亦趨的跟隨，並且當時就已於中國國內產生影響力，而這也有助於學生地位的累積。得別是當運到一些新出版的史料（如顧頡剛日記）後，筆者認為，更有助於還原新潮社在「五四」前的完整的面貌，也可彌補前人研究不足之部分。

此外，從當時各界對新潮社觀感的言論來看，更可看出這個社團的言論，是已形成一家之言的高影響力社團。筆者將其分為兩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，是支持者對新潮社的肯定。像《新潮》雜誌 1 卷 3 號以後，雜誌有了通信欄，是一個讓編輯群和讀者間有交流的地方。而從「五四」前余斐山、史志元、魯迅、楊鍾健等讀者的來信內容，可看到新潮社的言論，其見解是能使閱讀者

對該社議論產生認同的。<sup>02</sup>

在《新潮》雜誌外，亦存在著對新潮社的肯定。像當時盛傳北洋政府和支持傳統文化者，有意叫當時教育總長傅增湘（1872-1949）干涉北京大學校內的新思潮。所以，《晨報》的編輯陳溥賢也曾以淵泉的筆名，<sup>03</sup>在1919年3月30日寫了〈敬告守舊黨〉一文。而此文特對當時盛傳北洋政府，有意叫當時教育總長傅增湘干涉北京大學校內的新思潮的舉動，提出強烈的批判。<sup>04</sup>然而校內新思潮能成為主流，除了教師輩的《新青年》編輯群外，新潮社在校內也是相當關鍵的。而他的言論裡，也間接帶有肯定新潮社地位的意涵。而像這時期類似間接對新潮社地位的肯定，更散見於當時的諸報，諸如《順天時報》的「近來一班新學者之思想，發表於新青年、新潮等雜誌中，大為舊學者所駁斥」、《國民公報》的「近來思想界苞出的一支

嫩芽，不料竟有人想來摧殘」、《民治日報》的「今之北京大學，論者所指為新派者也」、《民國日報》的「自蔡子民君長北京大學而後，……其出版品，如新青年、新潮者，尤於舉世簡陋自封之中，獨開中國學術思想之新紀元」、《北京第一日報》的「自北京大學所出版之各種雜誌新青年、新潮等流行後，新思想支潮流日行擴張」、甚至是《成都川報》中誤把傅斯年當作當時北大教授而為其辯論的「不料現在竟被干涉，陳、胡、傅、錢四個人都解職出校，……大學月刊日刊和新潮雜誌都被封禁」的言論裡，都可知道「五四」前的新潮社，已有一定的社會地位。<sup>05</sup>

第二部分，則是反對者對於新潮社的詰難。從反對新潮社者的言論中，更反證了新潮社他們透過了新文化運動，迅速累積了他們的社會地位，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。可用幾個著名的例子作為代表。

1919年3月26日，時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，站在傳統派的立場致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，內容意指某些屬於北大學生的人「時論糾紛，喜為抨擊，設有悠悠之辭波及全體，尤為演進新機之累。甚冀執事與在校諸君一揚榘之，則學子之幸也」。<sup>06</sup>

02 余裴山，〈通信〉，《新潮》1卷3號，1919年3月，頁552-554。史志元，〈通信〉，《新潮》1卷3號，1919年3月，頁554。魯迅，〈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〉，《新潮》1卷5號，1919年5月，頁944-945。楊鍾健，〈通信〉，《新潮》1卷5號，1919年5月，頁948-949。

03 早期一般認為五四時期《晨報》上的淵泉，是李大釗的筆名。但有大陸學者在80年代中期作過詳細的考察，最後判定淵泉是陳溥賢的筆名。這個考察的過程，大陸的中國人民網有過介紹。網址為：<http://theory.people.com.cn/GB/41038/4746596.html>

04 他說北大校內所產生的新思潮，最多就是反對儒家學說，然「謂我堂堂民主國，因區區反對孔子學說問題，便欲幹預思想壓迫大學耶？思想之為物，與時代互為因果，豈權力所得而摧殘之者哉？」，可見他所持的反對言論是非常激烈的。淵泉，〈敬告守舊黨〉，《晨報》，1919年3月30日，第3版，【時評】。

05 這些評論，均收入在《每週評論》裡的轉載。〈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〉，《每週評論》第17號，1919年4月13日，【特別附錄】。〈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〉，《每週評論》第19號，1919年4月27日，【特別附錄】。

06 傅增湘，〈傅增湘致蔡元培〉，載於張允侯等編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（二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年），頁65。

蔡元培瞭解傅的意思是認為新潮社過為激烈，因此在回信時說「《新潮》持論或有易致駭怪之處，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將事，以附感情。事之方始，真相未明，輾轉相傳，易滋誤解，歷日稍久，情實自見」，<sup>07</sup>除可看出蔡表達為新潮社辯護的立場外，也可看出當時的時論裡，傳統派人士把新潮社言論當作過激派代表，也可顯現出新潮社在「五四」前已具有的社會地位。

而當時傳統派中態度最為鮮明的林紓，在《公言報》的社論裡，更言北京大學校內有學戰，先用諷刺的言論說「北京近日教育雖不甚發達，而大學教師個人所鼓吹之各式學說則五花八門，頗有足紀者」，後又談到「文科學長陳獨秀氏，以新派首領自居，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。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，有胡適錢玄同、劉半農、沈尹默等」，而使「學生聞風興起，服膺師說，張大其辭者不乏其人。……近又由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《新潮》者，以張皇其學說。新潮之外，更有《每週評論》之印刷物發行。其思想議論之所及，不僅反對舊派文學冀收摧殘廓清之功，即於社會所傳留之思想，亦直接間接發見其不適合之點加以抨擊」。<sup>08</sup>言談中可看出，反新文化人士對當時新潮社言論的認知，是其雖有承襲《新青年》之處，但其立場又更超過《新青年》。不過，由於林紓此言過於爭議，

07 蔡元培，〈蔡元培復傅增湘〉，載於張允侯等編，《五四時期的社團》（二），頁66。

08 林紓，〈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〉，轉載於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3月25日，第4版—第6版。

加以此文後面又想像了北大校內有新舊學戰造成學生的恐慌，所以當時被他視為校內舊派代表的劉師培（1884-1919）與國故月刊社，都紛紛跳出來為校內學風辯護，並批評林紓議論之誤。<sup>09</sup>

從這些著名的反對言論來看，更可看出新潮社在「五四」以前，外界所認定的地位，已經等同於《新青年》編輯群了。換言之，外界對新潮社的認知，並不認為他們只是《新青年》的附庸，兩者間的地位其實是相同的。

最後，從以上的討論，可看出「五四」前的新潮社，活動雖僅半年左右，然可知道他們在這段期間，已有了屬於他們的一套見解，從而透過這些活動快速累積聲名。藉著對「五四」前新潮社的研究，我們更可發現，學生在五四時代有引領風潮的能力，是因先前的名聲的奠基，才有了這樣的機會。而這種讓地位奠基的過程，放在此一時期的脈絡來看，也許才更符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程。

09 國故月刊社發表聲明說「貴報不查，既未明本社真象，復故猜測其辭，以為且軼範圍，而涉意氣」。〈國故月刊設置公言報函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3月24日，第6版，【通信】。劉師培則說「《國故》月刊社由文科學員發起難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《新潮》諸雜誌互相爭辯也。祈即查照更正，是為至荷！」。劉師培，〈劉師培致公言報函〉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，1919年3月24日，第6版，【通信】。